

度来看，贸易政策的作用也可以获得满意的结果，因为这些措施可以提高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在研究中，他首先假定，制定并实施相关贸易规定同时征收完全庇古税，其次假定外国的环境政策不变。在这两个假设前提下建立的两国一般均衡模型表明，当一国不愿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时，通过对他们的贸易进行限制能够提高全球经济活动的效率。Baumol 和 Oates (1988) 也获得了同样的结论，有效的贸易政策可以是贸易限制的，也可以是贸易促进的，这主要取决于环境问题的类型以及一国贸易差额的状态。

许多研究集中在贸易限制如何解决进口产品的外部效应问题以及如何使用贸易限制手段，通过控制“免费搭车”行为，以实现国际环境协议规定的目标。Pearce 和 Warford (1993) 把单向外部性分为消费外部性和生产外部性两种情况。GATT 认为，当进口产品存在外部性时，只有福利的净收益是正的，并且是以最小成本达到的时候，才能采用贸易限制手段。Pearce 和 Warford (1993) 认为这种要求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费用有效性不一定是与对于 GATT 所要求的条件（即贸易限制必须是保护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相对应的解释，也就是说，GATT 原则可能认为可以采用更昂贵的措施，只要它是值得的。第二，要求一项贸易限制措施不能对其他国家有歧视性，这不符合效率的原则。因为在“污染者付费”原则上，根据所造成的损失对不同的进口产品采取歧视性手段可能是最优的。GATT 也赞成对这些产品实行与国内同类产品相同的税收，因为这种外部性效应的产生来自于产品的消费而不是其生产过程。

贸易限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国际环境协定的签约方使用贸易限制手段，以控制“免费搭车”。也就是说，通过采用集体行动来胁迫违约者，以便加强全球多边环境合作。因此，这种限制被称为国际性贸易限制 (Pearce, 1993)。Reinstein (1991) 对此有这样的描述：“贸易限制要求的提出不仅是因为环境目标必须通过一项协议来保证，而且是因为多边环境协议会增加缔约方的成本，而非缔约方可以避免这种成本，所以缔约方可能会产生竞争劣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集体采取贸易限制的做法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

三、环境管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于环境管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理论上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一国较高的环境标准会减少本国厂商的出口，严厉的环境管制带来的利益甚至有可能随国外市场的丢失而抵消。Pething (1976), Siebert (1977), Yohe (1979), McGuier (1982), Palmer 等 (1995) 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理论辩护，他们认为更严厉的环境管制会成为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约束，具有更多约束的相同最大化问题只能导致同样或更低的利润。Robinson (1988) 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经验支持，他在对美国 1973—1982 年进出口商品污染含量增长率进行比较时发现，前者要高于后者，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中趋于更多地进口污染密集型商品。换句话说，美国严厉的环境管制对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起到了成效。Low 和 Yeats (1992) 通过对 1967—1968 和 1987—1988 年两组世界贸易数据比较，以验证环境管制对出口的影响。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优势指数，即一国某产业出口相对总额（某产业出口总额占世界该产业出口总额的比率）与其全部相对出口总额（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率）之比，如果该指数大于 1，那么该国在这一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有害物质详细目录资料，Low 和 Yeats 对钢铁、非铁金属、精炼石油、冶金制造和造纸等 5 个最具污染的行业指数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污染行业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增多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占据了很大的出口增长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产业占出口份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而肯定了环境管制对出口的影响。

第二种观点认为较高的环境标准对本国商品的出口没有什么影响或影响不明确。

Antweiler, Copeland 和 Taylor (2001) 通过引入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扩展了 Copeland 和 Taylor (1994, 1995) 南北模型，其研究结果表明，要素禀赋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环境政策差异对

比较优势的影响，当国家间资本与劳动差异足够大且资本丰裕国环境政策更为严格时，它仍将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Simpson 和 Bradford (1996) 认为严厉的环境管制对被管制产业的业绩影响是不一样的，也是无法精确描述的。实际上，人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例子说明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能够提高产业的长期竞争力和增加其出口。因此，以获得有利竞争条件为目的的严厉环境管制能否作为一种可行的政策措施令人怀疑。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如 Walter (1973) 对 1968—1970 年美国的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环境控制成本仅占出口商品总成本的 1.75%，显然，环境管制并不会对商品的出口构成大的影响。Tobey (1990) 利用 H-O 模型对 23 个国家 65 个产业（包括农业）中最具污染的部门进行了统计分析，不同的回归分析表明环境控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Grossman 和 Krueger (1993) 做了与 Tobey 相似的工作，也考察了环境管制对贸易流向的影响。他们使用了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数据，其分析结果再一次证明了环境政策并不能够影响贸易流向的结论。

Grossman, Krueger (1993) 和 Tobey (1990) 虽然证明了环境政策不能够影响贸易流向，但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控制成本未必就导致产出下降，因为一般均衡的力量可能抵消这种由控制成本变动引起的产出的减少。Eskeland 和 Harrison (2002) 指出，当控制成本上升时，会出现生产要素替代，如果这些替代要素的使用降低了污染排放，那么，它们导致的边际成本的减少量可能会超过控制成本提高所导致的边际成本的增加量。他们研究了美国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投资状况，结果发现这些投资去向与它们在本国产业所面对的控制成本并无太大关系。也就是说，环境政策没有对投资的流向起多大作用。

第三种观点的代表 Porter 和 Linde (1995) 认为，如果将环境管制与出口贸易的讨论置于动态的分析框架之下，即考虑到环境管制变动下生产技术、产品和生产过程改善的可能性，环境管制虽然暂时增加了厂商面临的限制条件，但它同时也给了厂商改革的动力，最终不仅不会限制出口，反而会提升出口结构和增加出口。

四、环境管制与“污染天堂”假说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常常有放松环境管制标准，生产出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品的动机。这种现象被称为“污染产业迁移”或“产业飞行”。另外，环境管制的缺乏也能吸引发达国家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人们又把这种现象称为“污染天堂”。不过虽然有很多的理论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但实证结果却有兩種不同的结论。

（一）否定“污染天堂”假说

Walter（1973）对1968—1970年美国的出口数据进行了分析，他发现，环境控制成本仅占出口商品总成本的1.75%，显然，环境管制并不会对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或出口模式构成大的影响，从而间接地否定了“污染天堂”的假说。Tobey（1990）利用H-O模型对23个国家65个产业（包括农业）中最具污染的部门进行了统计分析，不同的回归分析表明环境控制对贸易模式的影响并不显著。Grossman和Krueger（1993）做了与Tobey相似的工作，也考察了环境管制对贸易流向的影响。他们使用了美国从墨西哥的进口数据，其分析结果再一次证明了环境政策并不能够影响贸易流向的结论。

Lucas等（1992）根据有害物品详细目录资源和产业统计数据，首先计算出了美国不同行业单位美元有害物排放总量，然后假定这些污染强度对56个国家在1960—1988年间保持不变，并依次对上述国家有害物质污染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最后在考虑到贸易自由化对有害物的排放的影响后，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在1970—1980年，发展中国家有害物污染排放增长较快，但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封闭经济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Lucas等人认为对外贸易不会引起“污染天堂”。

Wheeler（2001）也提供了与“污染天堂”假说完全相反的证据。他指出，那些吸收了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比如中国、墨

西哥和巴西)的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二) 支持“污染天堂”假说

Robinson (1988) 为“污染天堂”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 他在对美国 1973—1982 年间进出口商品污染含量增长率进行比较时发现, 前者要高于后者, 这意味着美国在这一时期的贸易活动中趋于更多地进口污染密集型商品。换句话说, 美国严厉的环境管制对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起到了成效。

Low 和 Yeats (1992) 通过对 1967—1968 和 1987—1988 年两组世界贸易数据比较, 以验证“污染天堂”假说的存在性。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优势指数, 即一国某产业出口相对总额(某产业出口总额占世界该产业出口总额的比率)与其全部相对出口总额(一国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率)之比, 如果该指数大于 1, 那么该国在这一产业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有害物品详细目录资料, Low 和 Yeats 对钢铁、非铁金属、精炼石油、冶金制造和造纸等 5 个最具污染的行业指数变化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在污染行业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增多了;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 污染产业占据了很大的出口增长份额; 随着时间的推移, 污染产业占出口份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而肯定了“污染天堂”假说是存在的。

五、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协调问题

贸易与环境政策之间的冲突集中为究竟是利用贸易政策工具还是利用单边环境规制来实现环境目标。

反对采用贸易政策工具的学者认为, 大多数环境问题并非产生于国际贸易, 而是源于市场失灵, 因此, 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优目标并非贸易措施, 而是对消费或生产进行干预或者界定明晰的产权。Subramanian (1992) 认为, 不同的环境政策只是产生比较优势的因素之一, 环境禀赋、污染吸收能力以及环境的社会价值的差别同样

影响比较优势。因此，运用贸易工具以恢复比较优势是不合适的。但是，政府通常会采取单边贸易政策通过贸易制裁或贸易威胁来实现环境目标。Sorsa（1994）指出，政府不应采取单边制裁，因为许多国际环境问题是很难测量的，并受价值判断和科学的不确定的影响。

赞成采用贸易政策工具以实现环境目标的学者却认为，贸易工具是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跨境污染的有效途径。Whalley（1991）认为，对国际环境公约的道德承诺并不能保证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由于全球环境问题涉及的主要是公共物品，“搭便车”行为很可能会削弱为控制环境恶化而付出的努力。现有文献表明，由于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存在着难以抑制的来自主权国家的“搭便车”行为，因此一个由众多国家参与的有效的国际环境公约是很难达成的，因为用来鼓励主权国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合作的经济手段十分有限。但如果将国际环境合作与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综合起来考察，“搭便车”的行为动机便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因此 Whalley 认为贸易工具有助于实施环境公约。Barrett（1997）建立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环境合作的模型，集中讨论了贸易制裁在全球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其主要结论为贸易制裁有助于全球环境质量的改善，因为如果没有贸易制裁，从减少全球污染排放量的角度来看，国际合作仅能产生一种次优的结果。Barrett 还讨论了贸易制裁作为一种手段来强化国际环境合作的若干情形，发现贸易制裁在抑制“搭便车”行为的同时还令每个成员国的福利都得到了改善。

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结合起来一起使用，效果往往更好。Perroni 和 Wigle（1994）建立了一个 CGE 模型，在该模型中，假设有三个贸易区域，生产均受到污染的影响，其中两个区域产生的污染只影响本地区，而另一个影响全球，即跨国界环境污染。另外，假设政府征收排污税，厂商为减少污染必须交纳排污费，排污收入转移不影响生产者，只影响消费者。与 Walter（1973）的估计相似，Perroni 和 Wigle 用低控制成本对模型进行了拟合，模型的最终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在没有支付排污费用的情况下，贸易恶化了环境质量，但损害很小（损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模型中

被假定的损害函数的具体形式), 而通过征收排污费将环境外部性内部化后, 自由贸易可以改善环境质量和增加社会福利。

Beghin (1995) 使用了一个动态回归 CGE 模型考察了墨西哥 9 个带有不同污染强度 (由 13 类污染物所致) 的部门状况。墨西哥单边贸易开放引起的结构效应使其生产结构向着更清洁的部门变化, 但规模效应的支配作用最终会使污染加剧。污染税能提高污染控制, 但导致总收入的下降 (不同类型的污染收入下降的程度不同, 但均为负的收入效果)。污染税和贸易开放的有效结合能够导致收入增加, 污染减少。收入增加和污染减少的程度取决于被考察的污染排放物的类型。在 Beghin (2002) 对智利问题的研究中, 一方面, 智利的单边贸易改革, 因为进口了大量廉价的能源而导致环境恶化。另一方面, 对排污税的单边改革 (特别是微粒污染物质) 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Lee 和 Roland-Holst (1997) 通过建立的 CGE 模型考察了印度尼西亚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模式。他们发现, 印度尼西亚的单边贸易自由化将增大几乎所有污染物相对于实际产出的排放比率。然而, 当关税的取消与环境内部化的有效税收政策相联系时, 增加福利和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目标都是可以实现的。Dessus 和 Bussolo (1998) 运用 CGE 模型对哥斯达黎加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 只使用环境税能导致一个很小的增长下滑和很大的污染排放减少。只使用单边贸易改革虽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同时也促进了污染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并进而加强了对环境的破坏。而带有恰当排污税的单边贸易政策改革则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污染控制。

六、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实证研究

Dean (2000) 用回归方法验证了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水环境的改善。他首先建立了一个单一生产要素的 2×2 模型, 其中, 作为对环境质量的内在需求, 污染被内生化了。就像经典理论所描述的那样, 环境质量需求依赖于收入、商品价格和环境政策。基于这一

模型, Dean 用中国(1987—1995)各省的数据通过两个联立方程对水污染和收入增长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的结构效应对环境产生了直接的消极影响。然而,贸易改革会引起收入增加,由此导致水污染的减少程度(技术效应)超过结构效应所引起的水污染上升。因此总的效果是环境得到了改善。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中国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学者兰天(2004)对贸易和跨国界环境污染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探讨了贸易与跨国境环境污染的内在作用机制、跨境污染的贸易环境效应及控制跨境污染的贸易与环境政策,最后对中国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是:规模效应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结构效应总体来说会降低中国环境污染的程度;技术效应也降低了中国的环境污染程度。总之,实行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我国的环境质量的提高。李秀香等(2004)以CO₂排放量为污染指标,分析了1981—1999年期间我国出口增长的环境效应,结论是:随着出口的不断扩大、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提高及环境管制的不断加强,我国CO₂排放量的增幅出现了下降,贸易的规模、结构及技术效应均为正。许士春(2006)从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了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认为出口增长增加了对环境的污染,进口增长除了化学工业品及其相关产品对国内环境没有负面影响外,其他工业品的进口可能会加重我国环境污染。李斌等(2006)采用Panel-data模型方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该模型也采用了一般均衡方法,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也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利用各个省SO₂的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的指标。结论显示:规模效应加剧环境污染,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有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叶继革等(2007)通过对我国主要出口工业行业污染排放物的实证分析,得出了日益扩大的贸易活动增加了环境污染的结论。刘林奇(2009)运用Panel-Data模型从规模、结构、技术、市场效率和环境政策五个方面对我国不同区域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认为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而技术效应和市场效率效应则减少了环境污染,

环境政策效应减少了东部地区的污染，但增加了中部和西部的污染。

还有一些学者就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吴易明（2007）指出，环境经济政策之所以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其直接原因是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企业为了保护环境而增加了成本，成本的增加会提高产品的价格，降低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从而减少出口。廖玫、王瑾（2007）通过外国环境管制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回归分析时发现，外国环境管制对中国纺织品出口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王传宝、刘林奇（2009）分别从出口成本效应和出口创新效应两方面对我国环境管制的出口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环境管制的出口成本效应和出口创新效应均成立。

目前，国内有很多学者就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结论大致是，绿色壁垒阻碍了我国产品的出口，为了打破绿色壁垒，一要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二要到 WTO 争端解决机构进行申诉，等等。

赵玉焕（2001）对我国贸易与环境如何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环境成本内部化是协调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根本途径，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是协调贸易与环境的有效途径。董虹（2002）就我国的环境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只有两者协调发展，才能够既保护好环境，又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七、评 语

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由此而产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也多不胜数。由于受不同国家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在研究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数据及模型构造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结论自然就大相径庭了。除了上述不足外，贸易与环境问题关系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对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不多见。现有的研究要么更多地考虑如何对环境的发展更加有利，要么更多地考虑如何对贸易的发展更加有利，而对于如何促进二者协调的研究并不多见。

(2) 研究对象多是以发达国家或以发达国家为主,这就使得研究结论是否适合发展中国家值得怀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和贸易发展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南北国家之间关于贸易与环保之争本来就是贸易与环保领域重要的冲突之一,单以发达国家为背景进行的研究不仅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可能还会产生对发展中国家有失公允的结论。

(3) 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研究由于数据缺乏或模型构建不够严谨,使得相关的实证研究的结论缺乏可信度。

虽然目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第一,大多数学者认为贸易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只是由于受环境成本外在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出现了失灵,价格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贸易的扩大才有可能产生环境污染。第二,在解决环境问题特别是跨国界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显得特别重要,任何单方面的行动不仅容易引起相关方的冲突,其结果也是无效率的。第三,在环境管制对贸易的影响方面,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基本上都认为环境管制对贸易并没有重要影响,长期来看出口成本效应难以成立。实际上,贸易与环保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共同目标都是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提高社会福利,这奠定了协调两者关系的基础。成本内在化是协调两者关系的基本手段,如果环境成本能够完全内在化,那么贸易活动就不会带来任何环境问题。总之,将环境因素引入贸易理论,使传统贸易理论有了更大的适应范围,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挑战。

我国在贸易与环境领域的研究起步相当晚,研究深度也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发的水平还不高,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我国的数据收集也相对困难,给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但是,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目前已稳居世界第一,再加上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可以这么说,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应该更加重视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已成当务之急。

第三节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

一、研究内容

本书第一章是导言部分，主要介绍写作目的和意义，写作框架，以及国内外在本领域的研究成果；第二章和第三章为理论部分，阐述对外贸易与环境的理论性关系，其中第二章研究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第三章研究环境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第四章是实证部分，研究中国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效果，以及环境对对外贸易的影响效果；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对策研究，首先回顾国际社会在处理对外贸易与环境关系上的一些经验，然后介绍中国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探讨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

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有两个，一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二是数学模型与计量模型的运用。

(1) 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

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本书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然后运用中国的数据，从实证的角度检验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将二者的关系量化。

(2) 数学模型与计量模型的运用。

目前，关于贸易与环境问题的数学模型主要有以下几种：① CGE 模型（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② H-O 模型（赫克歇尔—俄林模型）；③ I-O（投入产出模型）；④ 福利模型（福利分析与影响测度，贸易利得的福利分析，环境政策的福利分析，环境政策对贸易净收益的影响）；⑤ 博弈模型（合作与非合作理论模型）；⑥ 最优化模型（寻求最佳贸易与环境政策）；⑦ 空间 GIS 模型（GIS 模型理论，GIS 模型应用）。

本书运用到的数学模型有：①福利模型。本书在研究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的环境效应比较时将运用福利模型进行分析。②博弈模型。本书在研究双边动态环境政策贸易效应时会运用到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另外，本书在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将运用到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

三、创新点

(1) 较详尽地比较了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本书从进出口角度、生产消费角度和国家大小的角度等方面比较了单独实施贸易政策与环境政策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以及比较了单独实施某一政策与两个政策结合起来治理环境污染的效果，从而从理论上验证了单方面制造贸易壁垒不是最佳保护环境的方式。

(2) 设计了双边合作的动态环境政策贸易效应。Conrad (1993) 和 Kennedy (1994) 只考察了双边不合作且进行数量竞争时的动态环境政策贸易效应，Barrett (1994) 只考察了双边不合作且进行价格竞争时的动态环境政策贸易效应。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寻求环境与贸易的合作，因此研究双边合作的动态环境政策贸易效应更具现实意义。

(3) 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本书在借鉴 Grossman 等人的三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市场经济不发达，总的环境规模较大等特点），再加了两个效应，即市场效率效应和环境政策效应。市场效率效应是指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是反映市场经济是否完善的一个指标，配置效率高，同样的经济增长需要较少的生产资源，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提高，而对外贸易的开展有助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环境政策效应是指环境政策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而对外贸易同样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环境政策而间接地影响环境。

(4) 较全面地对我国的贸易与环境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此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我国的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大多数是属于单方向性的分析,缺少环境或环境政策对我国贸易影响的系统性的实证研究,更少有人在贸易对环境影响的实证分析中,注意到地区性差异方面的问题,当然也就鲜见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地区性差异和行业性差异的影响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了。其实,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众所周知,我国的地区性和行业性差异很大,不可能也不适宜实行划一的环境政策和经济政策,因此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进行实证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和建议,意义非同一般。本书将较为全面地对这些问题一一展开实证分析,以便为决策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